

人力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对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贺寨平

(天津师范大学应用社会学系,天津 300387)

摘要:在CGSS2006数据的基础上,使用回归分解技术,对东部和中西部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不平等的贡献作了比较。就人力资本对不平等的总影响而言,东部和中西部差别微小。其中教育程度的影响,发达地区要大于不发达地区;经验的影响则正好相反。社会资本的情况则相反,发达地区要小于不发达地区,但是,政治资本对不平等的影响是,发达地区要大于不发达地区。这些结果否定了收入不平等的市场一元论解释,认为市场和国家联合作用对收入不平等研究的解释力更强。

关键词:人力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收入不平等;回归分解技术

中图分类号:C9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5)04-0042-0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平均9%的高速度持续增长,但与此同时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导致了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冲突增多,整个社会的不稳定程度呈现持续增加趋势。因此研究收入不平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十分复杂,本研究用新的统计技术侧重于探讨在市场转型中,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力图提出新的理论解释。

一、文献综述

1. 市场转型理论脉络中的文献

市场转型过程中收入不平等研究,以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为最早。此理论是倪志伟^[1]在波兰尼和萨列尼再分配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于1989年的一篇论文里首先明确提出的。在这篇论文里倪志伟提出了十个命题,核心的思想是:在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经济剩余不再为再分配者所垄断,而是通过类市场的交易进行调节和分配,所以干部的收入获益会减少,直接生产者获益会增加,也即政治资本的作用会减弱。同时,在类市场中,不像再分配经济中一样机械地积累工分,而是要在算计的

基础上作出长短期投资的决策,同时要掌握相关的技术,所以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作用会增大。倪志伟通过对调查研究数据的统计分析,基本验证了他的假设。但倪志伟的研究也受到了一些质疑,其核心就是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本的作用是不是真的已经式微,另外,他的早期研究样本局限于福建,并且以农村为主,而农村是改革的边缘地带,他的研究是不是真的能代表全国的现实状况。国内外以后的研究大多都是在对倪志伟市场转型论的回应、质疑的基础上作出新的解释。

边燕杰等^[2]在中国天津调查资料的基础上,部分修正了市场转型的理论。通过对1978—1993年四个时点的调查资料的分析,边燕杰等发现国有企业比集体企业的经济回报要高且逐年提高。对单位级别的经济回报也是如此。与此同时,该研究也发现了市场转型能解释的结论:首先,年龄的回报逐年减少,说明再分配体制的工龄作用的降低;第二,对教育的收入回报在增加;第三,对市场或类市场企业的经济回报在1993年超过任何单位。这些都说明,中国天津正处于转型过程中,其权力和市场都有回报。

收稿日期:2015-01-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3YJA840007);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3JZD02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CSH015);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3SHB006)

作者简介:贺寨平(1965—),男,山西兴县人,教授,博士,从事城乡社会学、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

萨列尼和科斯泰罗^[3]在分析关于转型的不同的研究结论时,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评论。在这篇评论中,他认为,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着三种市场渗透的类型:①再分配经济中的市场类型;②社会主义混合经济;③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在市场改革早期(东欧 1968—1980,中国 1977—1985),出现了地方市场,主要是食物和服务的交换,主体是农民和农民工。萨列尼等认为,倪志伟 1989 年的文章基本解释的就是这个阶段,该评论只有一点不符合实际,那就是人力资本在这时几乎不起作用,但倪志伟的文章却证明了人力资本起作用。

在 1980—1989 年的东欧和 1985 年后的中国,出现了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这个阶段商品市场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开始建立,资本市场也开始出现。不平等现象在东欧和中国都有所增加,根源既有市场因素,又有再分配因素,而人力资本对分层的作用也在加大。在这个阶段的获益者主要为小资产阶级、技术官僚、干部子女,前一类型中的先行者已被排挤到边缘。

在 1989 年之后,一种非常不同的市场渗透类型在东欧出现了,就是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在匈牙利和波兰,干部、一部分技术官僚已经变得非常有势力,并已成功地与新出现的后共产主义的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劳动力市场十分完善,资本市场也基本建立,对人力资本的回报更大了,不平等现象大幅度上升。萨列尼等认为当时中国还未进入此阶段。

边燕杰等^[4]延续了萨列尼的思想,具体分析了中国的实际。他们认为,萨列尼的市场多维发展的观点适于中国的实际。产品市场始于 80 年代初期,到 90 年代中期,绝大部分产品的价格已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一个完整的产品市场体系已经确立。劳动力市场要滞后一点;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形成,90 年代中后期劳动力市场完成。而资本市场更为缓慢,到 2002 年还只是初具规模。

边燕杰等同时探讨了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认为,虽然国家已不再行使再分配的功能,但并非完全不干预经济。具体而言:第一,在市场化进程冲击各个领域的同时,政府也改变了经济管理方式,从行政协调为主转向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为主。第二,虽然市场化意味着非国有企业进入生产领域,但国家对一些重要产业依然保持了垄断控制。第三,在国家放松对经济的直接控制的同时,国有企业逐渐获得了相对独立的产权和经营权。通过对 1988 年和 1995 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调查”资料的分析,研究发现伴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人力资本和政治资

本都在增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的收入相对于国家垄断经济组织中职工的收入在大幅度下降。

郝大海和李路路等^[5]认为,问题不在于收入受政治还是受经济的影响更大,而在于究竟这些因素是怎么影响的。他们探讨了区域差异背景下垄断的影响,证明了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国有垄断的优势越不明显。

罗纳塔斯^[6]于 1994 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对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匈牙利的研究。研究并没有证明政治资本回报的减少,而是发现昔日的共产党企业经理和政府官员,是今天的经济界的弄潮儿。罗纳塔斯的解释是再分配权力在匈牙利发生了两次变型:第一次变型是在匈牙利政局变化后,原来拥有再分配权力的人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已将政治资本变成了社会资本。第二次变型是指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原来的官员们拥有的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又转化为经济资本(即私有财产)。

与此相似,萨莱尼等人^[7]在对后共产主义的中欧的研究中,提出了资本转换论。基于韦伯有关社会类型的理论,他认为不同类型社会的支配性资本不同。共产主义是个等级社会,从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实质上是从等级秩序向阶级社会的转型。在共产主义体系中,社会资本(它被制度化成为政治资本)是权力和一切资源的主要来源。随着国家社会主义的衰退和后共产主义的兴起,政治资本的重要性在下降,文化资本的作用逐渐增多。

萨列尼在 1998 年出版的专著《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中,主要是论证中欧的情况,并认为以此可以概括所有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情况。在十年后该书中文版的序言里,他修正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中国、中欧、东欧在转型中是有区别的,认为中欧越来越近似于西欧,是“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东欧的情况是前共产党人承袭公共资源,摇身一变成为资本家的“政治资本主义”,而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从财产关系上是私人所有权与公共所有权并列,市场制度上是市场与国家再分配并列。这些研究无疑提出了新的思路,对本研究有重要的启发。

2. 新的统计技术:收入不平等的分解

上述研究,考察的都是各种因素对个人收入的影响,而不是直接探讨这些因素对整体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影响,虽然,在一般的情况下,一个因素对个人收入的影响越大,则对整个社会(或区域)不平等(经常用基尼系数、泰尔系数等来衡量)的影响也越大,但严格来讲,两种方法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好在随着统计技术的进步,一些研究者发现了新的解决

此类问题的计算方法,其中有一种就是运用夏普里值分解技术来探讨各种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比较典型的有万广华等^[8]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分解,陈斌开^[9]等对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的分析,这些研究涉及了实物资本、人力资本等因素,但忽略了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的影响。社会学领域则是陈光金^[10]首次运用此技术分析了中国社会不平等的影响因素,证明了当前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主要来源于市场化机制的不平等效应。赵剑治、陆铭^[11]探讨了社会关系网络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度,通过对中国农村家庭收入以及农户间收入差距的分解发现,社会网络对收入差距的贡献达到12.1%~13.4%,位居第四,在各种收入决定因素中,仅次于村庄哑变量、非农就业比重和教育。在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不管是社会网络对收入的提高作用,还是社会网络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度都明显高于中西部。

上述研究对于新技术的使用,以及对收入差距的原因都具有探讨启发意义,但同时,这些研究也有一些缺陷,如有的样本不能代表中国,有的研究技术较旧,又如对于社会资本的测量大多以“普特南框架”^[12]为准,由于该测量框架过分宽泛,所以颇有争议。唯一对社会资本的收入不平等效应做了分解的赵剑治、陆铭是在研究中临时采用了问卷中的现成问题,因此其测量不符合公认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本研究则用“中国综合调查”的城市样本,代表性较强。测量则采用社会学家林南的“地位生成法”^[13]以及边燕杰等人^[14]在林南方法基础上发展的“春节拜年网”的测量方法,该方法是社会学界获广泛认可的社会资本测量方法,能提高社会资本测量的信度和效度。同时,这些研究除少数研究^①外,大多数缺乏与市场转型脉络中的成果的对话。

总之,市场转型脉络上研究理论检验的成分重,但方法比较传统,而侧重统计技术的研究成果缺乏理论关怀,但方法比较新。本研究力图吸取双方优点,克服其弱点,采用新的分解技术来比较不同地区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1. 研究假设

根据前述市场转型的成果,有两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城市居民的收入主要由市场因素决定,因而,越是发达的地区,市场经济越发达,人力资本的作用就越大,而社会资本的作用就会越小,政

治资本的作用也会越小;另一类观点认为,市场和地区都是关键性的决定不平等的因素,在发达地区,市场的作用会导致人力资本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会更大,但政治资本的作用不一定比不发达地区小,社会资本也是如此。本文就是要通过对东部和中西部的对比来检验究竟哪种观点是对的。但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因此以下的理论假设以后一种观点为准。

就人力资本来讲,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必然导致人力资本的作用持续加强,因此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东部,人力资本的作用会更大。但是,根据前述多人研究显示,就教育来说,确实如此。就经验来说,情况有所不同:市场化的改革其实有打破再分配时代论资排辈的作用,由于东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更高,所以有可能削弱经验的作用。因此推出假设:

假设1:经验对东部地区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要小于中西部;

假设2:教育对东部城市居民收入的影响要大于中西部城市。

根据倪志伟等人的市场转型理论,市场转型的实质是由原来的国家控制大多数资源的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市场以追逐利润为目的,因而,市场的扩大必然意味着国家作用减弱,完全的市场经济中政治资本的作用会下降。在中东欧后共产主义国家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一方面,由于中国并未像中东欧一样出现国家政权的更迭,因而政治资本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在中国实际上出现了二者并进的情况,特别近几年,国家通过税收吸纳的资金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干预经济的力度加大。宏观层面的国家力量的加大,会使掌握着政治资本的个人获得更多的显性或隐性的收入。从市场经济的影响来看,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在东部地区政治资本的作用应该更低。但是,当考虑到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税收拥有的投资的支配权越来越大,政治力量无处不在,对此实际上是不好肯定的。

假设3:政治资本对东部地区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要大于中西部。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的实质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了利益最大化,企业或个人会尽可能地提供商品和服务来获得利润,因此在计划经济时代很多需要关系才能获得的商品和服务,在市场经济时代只需要用货币来购买,因此市场化无疑应该减少社

^①陈光金的研究有所涉及,但缺乏对各种“资本”的全面考察。

社会资本(关系)产生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具体到社会资本对收入的影响,找工作使用关系是极为常见的,但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在私有企业中,这种作用会降低。在国有企业中,随着企业的改革,那种按照血缘直接“顶替”的用工方式逐步减少,关系的作用整体上也在降低^[11]。但目前来看,由于这些年的“国进民退”,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也有所加大,“寻租”现象比较普遍,社会资本的作用不可低估。由于东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市场首重的是效益而不是关系,国家的作用也并不小,但市场仍是占主流的,所以可以推出:

假设4:社会资本对东部城市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低于中西部。

2.数据、变量与模型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06年(简称CGSS2006)城市部分,该数据库的详细介绍可参照中国人民大学相关网站。总之,该数据可以认为是代表全国城市居民的随机样本。

本文的变量如表1,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划分是按照2005年城市市场化指数标准,并参照了樊纲等人^[15]的研究成果,该指数主要依据各省的以下方面的情况: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并按照这五个方面计算出市场化指数。市场化指数高的地区分类为东部省市,包括: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其余为中西部省份(西藏、青海、内蒙没有调查)。

地域对于收入的影响,是学界公认的,谢宇^[16]甚至认为,影响中国人收入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地域差异,个人因素反倒是次要的,因此本文中在地域作

为控制变量,地域因素中包括两个变量,城市类型和所在省(直辖市、自治区)。

性别对于收入的影响,有不少成果已经证明^[17,18]。因此本研究也作为控制变量。

职业因素对于收入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ISEI^[19]作为国际学术界最为重要的职业声望测量指标得到学术界的公认,本研究采用ISEI职业得分作为职业的测量指标。

人力资本的测量一般分为教育和经验,本研究将推算的工龄和工龄平方测量经验变量,教育则以教育年限测量^①。

政治资本的测量经常用党员作为指标,但目前党员已达8000多万,实际上大多数党员在社会中地位也并不高,对于收入没有太大影响^②。所以,本研究将是否担任科级及以上职务作为政治资本的测量指标。

社会资本的测量使用学术界公认的春节拜年网测量方法^[14],其中一个指标是拜年网中职业的地位得分的总和。另一个指标是网络密度,用亲属在拜年网中的比例来测量。

本研究首先要做的是用半对数回归确定收入的决定因素,是否人力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对城市居民收入有影响,其次是计算基尼系数,确定这三种因素对基尼系数的影响比例。

因变量按照一般惯例采用月收入的对数。

收入模型采用明塞尔方程,并加以扩展,具体模型如下:

$$\ln(Y) = a + \sum_{i=1}^n B_i X_i + \varepsilon$$

其中 Y 指月收入, a 是常数项, B_i 为表中各个自变量的非标准回归系数, ε 为残差项。

表1 变量及其测量

变量分类	变量名	变量操作化
地域	城市类型 所在省、直辖市、自治区	直辖市、省会城市=1,其他=0 全部个案和中西部个案中,对照组为天津,东部对照组为湖南
性别	性别	男=1,女=0
职业	职业	ISEI 职业得分
人力资本	经验 经验平方 教育年限	年龄-教育年限-6 经验的平方 受教育共多少年
政治资本	政治资本	是否担任管理职务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总分 网密	拜年网中调查对象所选职业的地位得分总和 亲属在春节拜年网中的比例
因变量	收入对数	上个月收入的对数

①按照明塞尔方程,教育平方也应纳入方程作为自变量,但经计算,并无显著性。所以没有作为控制变量采纳。

②经计算,对收入的影响也不显著。

本文的另一个研究侧重点是对不平等的分解。不平等分解的方法有多种,但早期的分解方法要么只适用于两个组之间收入的不平等,要么分解结果依赖于分解因素在分解时的次序,万广华在夏普里分解方法的基础上,作了较大的推进,使其适用于各种回归方程和基尼系数等各种不平等指标^[20],因而该方法成为近几年学界公认的成熟方法^①,本文采用该方法力图使不平等的分解更为科学。

三、研究发现

1.人力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对收入的影响

在分成中西部和东部地区以后^②,结果如表2。可以看到,人力资本中经验的作用中西部和东部都是显著的,且经验和收入呈倒U形曲线,即中等工龄的人收入最高,但总体看中西部居民经验的作用要大于东部。而教育的影响则是东部大于西部,每多受一年教育,中西部居民增加5%的收入,而东部居民则增加6%^③。而政治资本在两个地区对收入都有显著的作用,但东部的作用更大,在中西部科级以上干部比一般群众收入高出16%,而在东部则为20%。而社会资本对于中西部和东部居民的收入也都有显著作用。就社会资本总分来说,每增加50分,东部能增1%,而西部能增加2.5%。就密度而言,亲属在拜年网中占的比例每增加10%,中西部收入减少2.0%,而东部则减少1.4%。不管是社会资本总分还是网密的作用都是中西部大于东部。

表2 分地域半对数回归模型

变量	中西部模型		东部模型	
	回归系数 B	标准误差	回归系数 B	标准误差
城市类型	.169 **	.035	.173 **	.035
所在省市				
性别	.235 **	.033	.197 **	.034
职业	.007 **	.001	.006 **	.001
经验	.011 *	.005	.005	.005
经验平方	-0.0003 **	.000	-0.0002 ₊	.000
教育年限	.045 **	.007	.054 **	.007
政治资本	.151 **	.046	.179 **	.043
社会资本总分	.0005 **	.000	.0002 ₊	.000
网密	-.224 **	.071	-.147 *	.068
截距	5.901 **	.112	5.963 **	.108
R ²	0.331 **		0.360 **	
N	1102		1015	

⁺p<0.1, * p<0.05, ** p<0.01. 所在省市的虚拟变量的系数和标准误差由于篇幅所限省略。

根据回归模型我们只是确定了收入的决定因素,但本文的独特之点却是要在此基础上用夏普里

值分解方法确定各个因素对不平等系数(本文中采用基尼系数)的影响的比例。

2.城市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分解

在将样本分作中西部和东部以后,结合表3,可以看出,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可以解释31.99%,而西部则为32.58%,总体上差别不大,但从经验和教育所占的比例中,可以看到,就经验来说,西部造成的收入不平等(8.82%)大于东部(6.02%),但教育方面,则是东部(25.97%),西部(23.77%),说明教育对不平等的影响在东部较大。总体上说明市场化会加大教育的作用,而减少工龄的作用。验证了假设1和2。

表3 城市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分解

变量	东部		西部	
	系数	贡献比例(%)	系数	贡献比例(%)
地域	0.07974	37.72	0.04619	21.92
包括:城市类型	0.0132	6.24	0.0151	7.17
所在省市	0.06654	31.48	0.03109	14.75
性别	0.01589	7.51	0.02296	10.89
职业	0.02215	10.48	0.02935	13.93
人力资本:	0.06762	31.99	0.06867	32.58
包括:经验	0.01273	6.02	0.01858	8.82
教育年限	0.05489	25.97	0.05009	23.77
政治资本	0.01657	7.84	0.01291	6.12
社会资本	0.00942	4.46	0.03067	14.55
包括:社会资本总分	0.00519	2.46	0.02188	10.38
网密	0.00423	2.00	0.00879	4.17
被解释部分	0.21140	100	0.21076	100
基尼系数	0.37907		0.35508	

注:夏普里值分解所得值具有可加性,所以把经验和经验平方合起来在表中呈现。

政治资本对收入不平等也有影响,从东部样本来看,政治资本能解释基尼系数的7.84%,而中西部只能解释6.12%。假设3得到了验证。在东部,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同时,“政府能力”也在加强,因而政治资本的作用也增强了。

社会资本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情况是:在东部,社会资本只能解释基尼系数的4.46%,而在中西部则能解释14.55%,验证了假设4。说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资本作用的消减是必然的,这和政治资本形成了对比。

①具体模型可参阅前书,此处不再赘述。感谢万广华教授无偿提供他编写的分解程序。

②在作了邹检验以后,F检验在0.00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说明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存在着差异。

③这里的百分比计算方法是,自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收入增加的百分比为 $\%y = 100(e^{\beta} - 1)$ 。

四、结 语

通过以 CGSS2006 数据为基础,首先运用多元回归对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收入的影响进行了计算和分析,然后重点用不平等分解技术对各种资本对不平等的影响作了计算,验证了研究假设,主要的结论有:①在人力资本中教育程度的影响上,发达地区要大于不发达地区;经验的影响则正好相反;②社会资本的影响情况则相反,发达地区要小于不发达地区;③政治资本对不平等的影响是发达地区要大于不发达地区。

长期以来,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是市场导致了不平等,还是非市场因素导致了不平等。如果我们将人力资本看作是市场决定,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看作是非市场部分决定。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为 31.99%,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之和为 12.30%。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影响为 32.58%,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合之和为 20.67%。这说明市场因素是收入不平等的决定因素。

但也应该注意到,政治资本在东部要比在中西部对不平等的作用更大,说明国家因素对不平等的加强作用也不可低估。再分配的因素仍然是重要的因素,同时也有可能与政商勾结导致的权力寻租有关。

因此,概括起来,收入不平等是市场和国家联合作用的结果,市场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但国家的作用也不可低估。

如果将东部看作西部的未来的话,并把东部看作是一种趋势的话,似乎可以说,人力资本中教育的作用会越来越大,社会资本的作用日渐式微,而政治资本在目前阶段的加剧不平等的作用有可能进一步加强。总体上说,中国发展的总体方向是,市场化具有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发展完全是经济的线性函数,政治因素和社会关系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可以预料,政治因素的影响会随着政策的变动不断起伏,因而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收入和收入差距的影响也会不断变化,但市场化的基本趋势是无法逆转的。

参考文献:

[1] NEE V.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9, 54(5): 663-681.
[2] BIAN Y, LOGAN J R.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 61

(5): 739-758.

- [3] 萨列尼,科斯泰罗. 关于市场转型的争论:走向综合?[C]//边燕杰.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574-589.
[4] 边燕杰,张展新. 市场化与收入分配:对 1988 年和 1995 年城市住户收入调查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2(5):97-111.
[5] 郝大海,李路路. 区域差异改革中的国家垄断与收入不平等:基于 2003 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资料[J].中国社会科学,2006(2):140-151.
[6] RONA-TAS. A. The first shall be last?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4,100(1): 40-69.
[7] 伊亚尔,萨列尼,汤斯利.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后共产主义中欧的阶级形成和精英斗争[M].吕佳龄,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8] 万广华,周章跃,陆迁. 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运用农户数据的回归分解[J].中国农村经济,2005(5):4-11.
[9] 陈斌开,杨依山,许伟. 中国城镇居民劳动收入差距演变及其原因:1990—2005[J].经济研究,2009(12):30-42.
[10] 陈光金. 市场抑或非市场:中国收入不平等成因实证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0(6):86-115.
[11] 赵剑治,陆铭. 关系对农村收入差距的贡献及其地区差异:一项基于回归的分解分析[J].经济学季刊,2010(1):363-390.
[12] PUTNAM R. D.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13] LIN 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4] 边燕杰,李煜. 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J].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2000(2):1-18.
[15]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09 年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16] 谢宇. 认识中国的不平等[J].社会,2010(3):1-20.
[17] 李春玲,李实. 市场竞争还是性别歧视:收入性别差异扩大趋势及其原因解释[J].社会学研究,2008(2):94-117.
[18] 王天夫,赖扬恩,李博柏. 城市性别收入差异及其演变:1995—2003[J].社会学研究,2008(2):23-53.
[19] GANZEBOOM H B G, DE GRAAF P M, TREIMAN D J. A standard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 [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992, 21(1): 1-56.
[20] 万广华. 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均等:方法与证据[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